

· 走进现代文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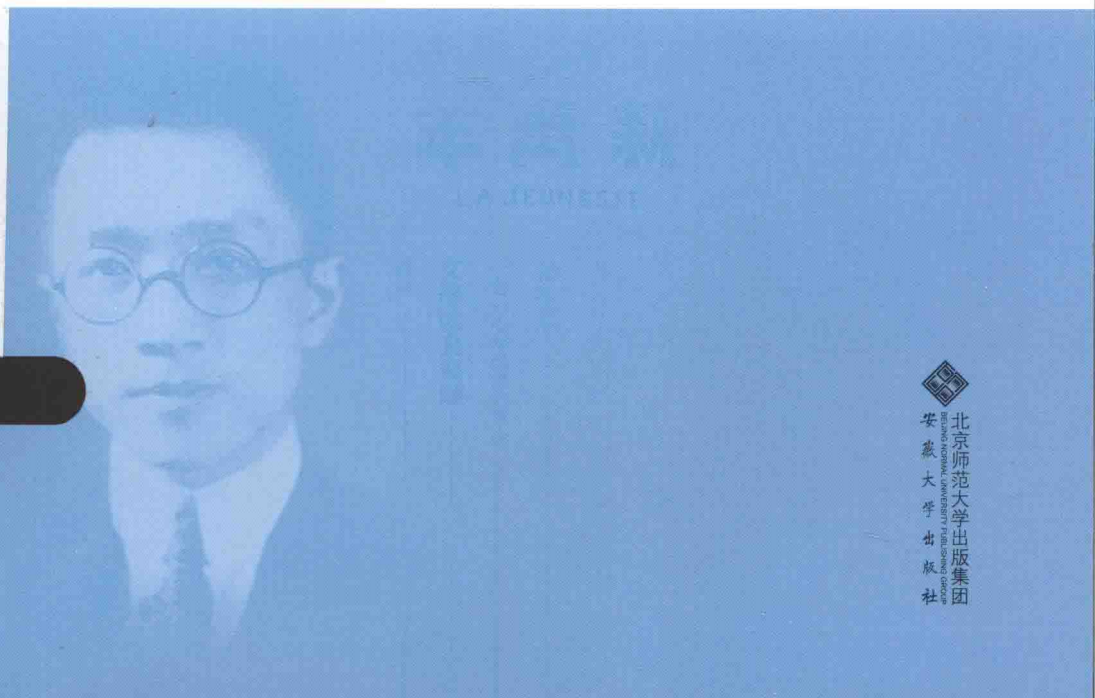
胡適



与

新文学

沈寂 汪晴◎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胡適

新文學

第一卷第一號



明適

与

新文学

沈寂 汪晴◎编著

· 走进现代文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ANHU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与新文学/沈寂,汪晴编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664-0932-4

I. ①胡… II. ①沈… ②汪… III. ①胡适(1891~1962)—文学思想—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8098 号

胡适与新文学

hu shi yu xinwenxue

沈 寂 汪 晴 编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 徽 大 学 出 版 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8.7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ISBN 978-7-5664-0932-4

策划编辑: 卢 坡
责任编辑: 卢 坡 倪劲炜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李 军 金伶俐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走进现代文化”丛书出版缘起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易名《新青年》),倡导民主和科学,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积极响应,发起了“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敬告青年》《庶民的胜利》《文学改良刍议》《狂人日记》等一大批经典文章集中涌现出来,影响了几代人,甚至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

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有了一定的距离去审视那段历史,能够从中得到哪些经验或教训?是怎样的内在力量让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富强奔走呼号,甚至流血牺牲?我们想这不仅是专家学者们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也是一般大众读者想要了解和应该了解的。

安徽大学出版社在几年前曾出版过“走进传统文化”丛书,目的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传统文化,其中已出版了《〈老子〉今读》《〈孝经〉今读》《〈论语〉与人生》等,准备出版《〈庄子〉今读》《〈世说新语〉今读》《〈淮南子〉今读》等,此套丛书已在社会上产生较好的影响。我们拟仿照“走进传统文化”丛书,策划出版一套“走进现代文化”丛书,不仅希望年轻人了解传统,也希望他们了解现代。陈独秀在《敬告青年》指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

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两套丛书主要都是为青年读者服务的。

热忱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批评建议，以便于我们加以改进，将这套旨在为爱好文史的青年读者服务的丛书编辑好，出版好。

安徽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编辑部

2015 年 5 月

Mulu

目录

新文学运动开路人	1
由少年诗人到新诗鼻祖	33
胡适与诗体解放	49
简单明了的散文写作	64
戏剧翻译、改良与创作	67
《论短篇小说》和《一个问题》	70
 附录一 胡适文学作品选	 72
小说：一个问题	72
戏剧：终身大事	79
新诗：《尝试集》（节选）	91
 附录二 胡适文学评论选	 102
文学改良刍议	102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113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16
后记	133

新文学运动开路人

一、结胎在美洲新大陆

1915年夏天,胡适决定由康乃尔转去哥伦比亚,临行前,约中国留美学生任鸿隽、杨铨、唐钺以及安徽老乡梅光迪在绮色佳度假。业余钻研汉字改革的胡适,说出了他的心得:中国的“文言为半死的文字”。这是一个大胆的革新见解,任、杨等人听了未有强烈的反应,而梅光迪却坚决不同意胡适的观点,并由此发生了辩论,终于引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

梅光迪,安徽宣城人,是比胡适晚一届的庚款留美学生。当时他正由威斯康星大学读完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准备转入哈佛大学,投从慕名已久的文学批评家白璧德继续深造。白璧德(1865—1933),一译巴比特·欧文(Irving Babbitt),是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白璧德钦佩中国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倾向比较保守。胡适与梅光迪意见的分歧,与各自导师的学术观点有关。

胡适在事后总是说,文学革命是由一连串的小事引发的,他主张偶然论,反对必然论。其实,胡适所列举的几件偶然发生的事件,都不是偶然的。如他说:他在留美期间,每月均有驻华盛顿的清华学校监督处寄给他一张支票(即庚款),信封里总是装有一张小传单。传单的内容大致是:“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写此传单的是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出身的

好好先生钟文鳌。开始收到时,胡适并不重视,把它往字纸篓里一丢了事。可是后来看不下去了,即在1915年对此传单回敬了一张小字条:“像你这样的人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先费几年功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回敬的字条寄出后,胡适又后悔起来,觉得钟先生不懂汉文,虽是没有资格谈此问题的人,却提出了问题,精神是可嘉的。他认为他自己和赵元任等是有资格谈此问题的,但有资格谈而不去研究解决,就应该受到钟先生的训斥。于是他即和赵元任相约分头研究。钟文鳌激发了胡适的责任感。但一个人是否有责任感,不是在偶然之间可以产生的。

胡适分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其主要内容有:

(一)文言与现在的语言差距甚远。如文言的“犬”,今语为“狗”;文言“乘马”,今语“骑马”。“犬”与“乘马”已是死语,“狗”和“骑马”才是活语。文言或称“半死的文字”。现在教授文言,必须像教外语那样,通过活语的翻译,就是所谓“讲书”。

(二)字有“声”与“义”,无论哪一种文字均不能二者兼备。字母的文字,只能传声,难以达意。象形会意的文字,只可达意而不能传声。而今天的汉文,已失去象形会意指事的特长。教授的人,又不懂《说文》学。其结果,致使中国的文字既不能传声,又不能达意,学习汉文的人,不但要强记它的字音,又要强记它的字义,事倍而功半。要补救这个弊病,就当学字源学,同时列出汉字的古体与今体。小学的教科书尤当先教童蒙学习象形与指事的字,然后再学浅近的会意字乃至浅显的形声字。这种字源学,凡中学

以上,都应当开设这门课。

(三)建立文学学。

(四)采用一套规范的标点符号。

胡适在此时提出文言为死的或半死的文字之“革命性”口号,还具体提供教学中的补救办法,同样不是灵机一动就从天而降的。

只要查考一下胡适留学美国后的读书活动,就可发现,胡适无论在学农期间,或择定哲学为自己的职业之后,都没有停止过对文字的研究。

胡适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立志以文字服务于社会。在考庚款留美时,他二哥的同学杨景苏建议他看《十三经注疏》等汉学书。胡适自幼所读的传统书籍,都是官方规定的由宋儒批注的书。胡适当即买了一套石印的《十三经注疏》,还把它带到美国。他首先研读的是《诗经》,1911年5月即撰著出《诗三百篇“言”字解》;1914年又写了《“的”字文法的研究》;1916年又从经籍中研究古人对“尔”、“汝”的用法,以及“吾”、“我”的用法,发现当时使用的含义与今天使用的含义,已有很大差距,先后写成《尔汝篇》和《吾我篇》。胡适突破了单一的宋儒圈子,发现宋学与汉学有明显的差别。于是发挥他自幼就有的“怀疑精神”,并使用“以经解经、参考互证”的治学方法,更结合西方的归纳法理论,推翻了自古以来的权威著作《尔雅》的解释。

1916年以后,胡适又涉猎校勘、训诂等考据学,把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与西方的《版本学》以及杜威的“有系统的推理思考理论”相比较,发现有相同处。他认为我国乾嘉学派的归纳比较方法是极其严谨和极其科学的。中西校勘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殊途同归,只是西方的方法更为科

学罢了。我国的传统学者缺少对不同语言比较文法的研究。胡适兼收并蓄,成为“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者”。

胡适作《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实是他自认字以来读书经验的总结。他的父亲教他认字,解字;他的老师为他讲书。他之所以对读书感兴趣,无不得益于“解字”和“讲书”。鉴于文言与口语的距离日益加大,认字必须解字,读书必须讲书,才能懂得“字”的意义和书的内容。

胡适提出要建立汉文的文法学,为原来不分段、不加点的文言文,分明段落,标点断句,这是从西方文化中吸取的经验。

凡受过中国旧学训练的人出国留学,很自然会以西语的文法来治汉文。清朝末年,中国的留学生普遍这样做了。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就是典范。胡适在留美前,曾读过此书,对西方的归纳理论,就是首先在《马氏文通》中接触到的。他在1911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大叹马眉叔(建忠)用功之勤,真不可及,近世学子无复如此人才矣。若贱子则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表明他亦有志于此。1912年胡适在赴北田途中的车上,曾设想了一种采用字母统一国语读法的方案。他说,这一方案与后来1914年教育部“全国读音统一会”的报告中所列的方案大致是相同的,“此种字母之用,在于字典上用字母注明音读”。1915年8月2日,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刊载于《科学》杂志上。现在的《胡适留学日记》中仍保留多篇关于标点符号的论述。我们今天所用的标点符号,即导源于此。这是胡适长期研究的结晶,而“非一时兴到之作”。

不过,胡适在此时还没有想到可以用白话文完全取代文言,也不主张废置文言,只是想改良古文的教授方法,使文言更好地为新时代服务,“是一种过渡时代的补救方

法”，但文学革命的架势已经齐备，呼之欲出了。

二、辩论中激发出“革命”光焰

胡适提出的“文言为半死的文字”的意见，在遭到梅光迪强烈反对之后，迫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论。在9月17日梅光迪赴哈佛大学时，胡适赠“送别”长诗一首，再次申述自己的论据。诗的开端说：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这是一首打油诗，其中用了十一个外国人的名字，例如爱默生、霍桑、达尔文、拿破仑等。任鸿隽看了即择其中一些外国人名，缀在一起，也作了一首打油诗调笑胡适：

牛敦爱迭孙，培根达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诗的最后两句，无疑是挖苦他“文学革命”的狂言。胡适满腹委屈，认为自己对此是十分严肃的。又以庄重的口吻作了一首答诗，指出致力于中国文学革命，其贡献不下于征服自然，是“缩地戡天”，因是打油诗写的，所以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于是在“文学革命”口号之中，又提出了“诗国革命”，并且已诠释为“要须作诗如作文”。

1916年是胡适与梅光迪等辩论最激烈的一年。梅光迪针对“作诗如作文”的提法说：“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任鸿隽也附和梅的意见。胡适虽被孤立，仍争辩说：今日文学

的病就在徒有形式而无精神。补救的办法：须言之有物，须讲究文法；当用“文”之文字，不可回避。明确问题的症结在于“有文而无质”。胡适在美国的朋友都不同意他的意见，连任鸿隽也不明了“文字的形式”往往可以束缚文学本质这一道理。“旧皮囊装不得新酒”，他举出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即由欧洲各民族的语言作为新工具，代替了那已死的拉丁文旧工具所致。欧洲文学革命，就是工具的革命。由此，胡适充满信心地指出，中国的文学到中古以后，旧有的工具已不能充分表达当时人的思想和观念了，要求有一种新的工具来代替它。俗文学由此应运而生。早在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就是复兴散文在体裁上的革命，从而产生一种以白话来表达的“语录体”的新文学。这种体裁首先为僧侣们所采用。后来宋儒也用此体裁来记录他们的哲学讨论。以后这种文体就普及到一般市民，利用它作歌曲，再进一步就有人以白话来创作小说和戏曲。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

1916年5月，胡适把他研究所得的见解，以长信的方式告诉了在哈佛的梅光迪。出乎意料，梅光迪居然接受了。梅光迪是研究西洋文学史的，在“民间文学”这个问题上与胡适的观点一致。他在复信中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反对者竟站到“我辈”的立场上来了，怎不教胡适喜出望外。

于是胡适进一步从“韵文”和“散文”两个方面，在中国文学史上求证“文学革命”。韵文自“三百篇”之下，在

3000 年来的流变中,有过一连串的革命。散文自老、庄、孔、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如此。他特别强调元代以来戏曲和小说的出现(当时胡适等人尚没有弄清《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长篇小说的写作年代,都认为产生于元代),活文学由此即在中国出现。但到明代,仿古文学再次占统治地位,文学革命暂时遭到挫折。在这段时间里,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比较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大纲。

“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褰旗作健儿!”他信心十足。

就在那年夏天,胡适去俄亥俄州的克利佛兰城参加“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来去都路过康乃尔所在地绮色佳。与在那里度暑假的老友任鸿隽(叔永)、唐钺(擘黄)、杨铨(杏佛)等人聚首八天,再次讨论文学方面的诸多问题。归纳起来有九个方面,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有:(二)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所谓“俗”〈Vulgar〉便是通俗。它和“俗民〈folk〉”一字在文学上是同源的);(四)白话不但不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凡文言文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文未必能及之;(六)白话并非文言文之退化及文言文之进化;(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胡适持这些系统的新创见与梅光迪讨论“造新文学”问题,并“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胡适还声称“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梅光迪不同意胡适的这些意见,“大肆攻击为 utilitarian(功利主义),又以为偷得 Tolstoy(托尔斯泰)之绪余;以为此等十九世纪之旧说,久为今人所弃置”。胡适对梅光迪的批评不以为然,并认为梅所批评的原著,自己并没有读过,那些只是道听途说,拾人牙慧,无真知灼见。他认为中国的文学应该依据中国的

历史境况来论定，不要管西方批评家有什么议论。又说我的意见如是正确的，即使是功利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又何损于此。我的意见如不正确，就应该批评我的错误，也不必问它是功利主义还是托尔斯泰主义。

与此同时，又有一件偶然的事，促使这场争论继续向纵深发展。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杨铨、唐钺等人，在胡适由绮色佳返回哥伦比亚大学数天之后，泛舟于凯约嘉湖，在游人情意盎然的时刻，忽然狂风大作，大雨骤至，游船疾驶临岸时又突然翻船，游客落水，均成了落汤鸡。任鸿隽将此情景写成《泛湖即事》长诗，并寄胡适。其中对覆舟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荡荡平湖，漪漪绿波。言棹轻楫，以涤烦
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行行忘远，息楫崖
根。忽逢波怒，擎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
翩翩一叶，冯夷所吞。舟则可弃，水则可揭。湿
我裳衣，畏他人视……

胡适看了之后，回信批评说，“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岸逼流回，石斜浪翻’，岂非好句？可惜为几句大话所误”。任鸿隽承认他在“布局”全诗时，本是“用力写的一段”，“或者用力太过，遂流于大话”。因此，他又向胡适征求改进的意见。胡适于是复信说：诗中的“言”字和“载”字，都是死字。“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的上句是 20 世纪的活字，下句则是 3000 年以前的死句，十分不相称。他说他曾写过《诗三百篇中的“言”字解》，看到诗中用“言”字，就“有点不舒服”。

读罢来信任鸿隽立即表示：不敢苟同。他回信对胡适说：“岂因《诗经》中曾用此字，吾人今日所用字典便不当搜

人耶？‘载笑载言’因为‘三千年前之语’，然可用以达今日之情景，即为今日之语，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语’。”任鸿隽的反诘，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

对胡、任的争论，梅光迪指出：文学革命固然需要洗涤旧日的陈词滥调，“然似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又说：“俗语白话固亦有可用者，惟必须经美术家之锻炼耳。”胡、梅重又开战。胡适又以打油长诗回答梅光迪：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胡适在诗中继续与梅光迪讨论死文字与活文字的不同。梅生却以轻蔑的口吻回报：“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梅光迪的讽刺，却是抬举了胡适，因为“莲花落”正是正宗的民间文学！

任鸿隽也对胡适说：“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